

茶马古道
跨越巅峰的生活

百年
商■滇
年

云南省商务厅百年滇商丛书编委会

熊清华 主编



百年滇商

熊清华 著

卷一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百年滇商

熊清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滇商 : 1840 ~ 1950 / 熊清华著. -- 昆明 : 云
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222-09635-6

I . ①百… II . ①熊… III . ①商业史—云南省—
1840 ~ 1950 IV .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535 号

责任编辑：尹杰 王曦云
装帧设计：钏祚伟 李蕾
责任校对：余祁 骆號
责任印制：陆卫华

书名	百年滇商
作者	熊清华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x1092 1/16
印张	15.75
字数	184.6千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9635-6
定价	66.00元

云南省商务厅
百年滇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熊清华

编委 杜 勇 李极明 王开良 杨 慧

朱晓阳 赵 平 王建伟 孙 燕

朱 非 杜俊军 马永福 周学文

林超民(特聘) 木霁弘(特聘)

摄影 熊清华 木霁弘 李 维 李德佑

方震东 杨海潮

总序

回望和弘扬百年滇商的宝贵遗产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
经济学研究员 熊清华

1840—1940年的一百年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内在资本要素的发育，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就其原因来讲，外因和内因都很重要，它们相互碰撞和新生。外力的冲击加速了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连锁反应，如户籍管理制度的弱化、西学东渐、工具时代的技术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因素，为中国各地民间商业活动的复兴提供了条件、空间和舞台。在这个大时代，云南的商业也不可能避免地受到了与世界息息相关的冲击和震荡，一批影响深远的商人和商帮在这时期脱颖而出，一系列云南的品牌也在这期间诞生、发展和壮大，相应的商业文化、理念、精神也相伴而生。对“百年滇商”的梳理、书写与重构，实际上就是通过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回望，从而把滇商文明挖掘出来、传承下去。

相对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核心区域而言，云南是边疆，曾是蛮荒和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另一面的价值则在于云南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往南可通东南亚，往西可通南亚，往北、往东可接中国腹地。从文化地图上讲，云南还地处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



通道上，而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在自然资源及产品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由于地利之便，云南的商人与印度、与越南、与缅甸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中原地区。这些商贸往来不仅带来了物资的流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这个视角聚焦之下的云南代表的则是开放与前沿。回顾1840—1940年间云南商贸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探究云南所具有的这种双重理性。

凡到过云南的人都知道，云南境内山多路险，地形错综复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商业运输几乎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于是马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云南特有的茶叶、盐巴、烟草、玉石就是靠这样的形式运输出去与市场消费连接的。与平原地区相对先进的运输形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运输形式，带来的利润也是如此，无法选择其最大化。而另一方面，这种运输方式也成就了云南许多著名的独特商帮，成就了云南商人吃苦耐劳、笃守信誉的优良品格。这些古道虽然早已冷清，马帮铃声已经远去，但是沿途高山河谷打磨出来的云南商人的宝贵精神至今犹存，尘封而不失光彩。

19世纪末，是一个结束与开始、发展与扬弃的时代。1887年，蒙自开辟为云南对外开放的商埠，1889年，蒙自海关落成并正式开关，成为云南的第一个海关；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把云南的河口、蒙自、昆明三个通商口岸连在一起，于是，云南80%以上的进口物资便通过滇越铁路在蒙自转运。另一方面，在蒙自开关后，洋纱、布匹、日用百货等进口商品大举进入，进口大增，全省21个府厅中有20个府厅、93个县，以及贵州、广西、四川、湖南都从蒙自口岸进口商品以满足市场。滇越铁路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它拉开了云南的近代化序幕，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和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云南几千年来偏远闭塞的历史，对云南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述情况，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翻开明清时代的历史，我们不会忽视在社会经济出现的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徽州（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

山东十大商帮，而又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安徽商帮）最为著名。在这一时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也出现了几大商帮，如“腾冲商帮”、“鹤庆商帮”、“喜洲商帮”等等。与国内的一些商帮相比，这些商帮可能小一些，但却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要的典型特征，这些商帮为云南的商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优良的商业传统和精神提供了宝贵的内容。

这几年陆续播出了以明清商人为原型或商业活动为背景的《胡雪岩》、《乔家大院》、《大宅门》、《昌晋源票号》、《驼道》、《钱王》等多部电视剧。其中，《乔家大院》讲的是勤俭持家、注重信用的乔致庸的故事；《大宅门》讲的是同仁堂的前身、专供药于官家的百年老号百草厅白氏家族的兴衰；《钱王》描述了艰苦奋斗、奔波劳累以德服人的清末红顶商人王炽的传奇一生。我之所以专点这三部，不是说这三部最好（当然很好），而是说它分别讲述了中国三个省份的商人代表，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白景琦是京商的代表，王炽则是滇商的代表。我以为，云南商人最是心系家乡的公益事业，最是关心国家的命运，从弥勒商人王炽到宣威商人浦在廷、大理商人李琢庵、保山商人梁金山、腾冲商人寸玉亭，他们无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大潮之中，捐出自己的财产，为社会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确实是云南的一大商业精神。近现代云南商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了云南各地、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该套丛书的出版可说是对“百年滇商”商贸遗产做的总结、梳理及研究。尽管我们能力不及，但这毕竟是云南省商务厅及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长期酝酿多年研究的成果展现，旨在缅怀商界前辈、弘扬滇商精神、追思商脉过往、传承滇商文化。丛书对云南经济文化研究，特别是商务文化建设做了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相信该丛书会使更多的人关注滇商的发展。



前言

用丛书的形式，把云南百年来的杰出商界先辈的足迹、业绩和精神、理念记录下来，发掘出来，传承下去，以不至于随着时间的飞逝，使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被茫茫史海所淹没，是我从保山市委书记的任上转任云南省商务厅长后的一个强烈愿望。当2011年的秋天那个满怀金黄色喜悦的季节，我向我的同事，以及学界的一些朋友谈了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想到大家都是完全赞同，并言要把它作为商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来做。我为此兴奋了好几个晚上。是的，一个人有想法并不难，难的是要让大家都理解、都赞同，尤其是那些不能由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更是如此。当然，它的进展很顺利，这也就不再赘述了，因为它拥有了一个好的认识基础。

说起商人，用现在的话讲是商务工作者，他们的活动源远流长，但在中国，他们的事迹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是被扭曲的，士农工商，商是之末，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走向现代文明，人们才开始注重商业、研究商业、发展商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和商业领袖们。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对历史上的商业领袖及其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明清以来商人的事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几年陆续播出了以明清商人为原型或商业活动为背景的《胡雪岩》、《昌晋源票号》、《驼道》等多部电视剧。其中的《乔家大院》讲的是勤俭持家、注重信用的乔致庸的故事；《大宅门》讲的是同仁堂的前身、专供药于官家的百年老号百草厅白氏家族的兴衰；《钱王》描述了艰苦奋斗、奔波劳累以德服人的清末红顶商人王炽的传奇一生。这些电视剧分别讲述了中国三个省份的商人代表，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白景琦是京商的代表，王炽则是滇商的代表。当然，这些人物无疑也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 100 年里，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走近现代社会，这一“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迁。云南作为一个内陆边疆省份逐渐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个课题。但是，我认为以往的研究既没有注意这一百多年的云南所具有的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地位，也没有在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有自觉的追求，更没有提供普遍性的结论和方法，不能“见树又见林”，因此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材料编纂和材料输出性质的粗线条描写。

记得在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过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与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伦理观密切相联系，后来，又发表《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试图阐明中国的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韦伯的这些研究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色彩，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过程并非资本主义的唯一的过程，而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他对中国的分析也缺乏事实的支持，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也否定了韦伯的结论。事实上，在明清以来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商人精神和文化理念中，已经具有了那些被韦伯视为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等伦理训条，“诚信”更是各个商帮共有的文化精神气质。只是这些伦理训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量身打造的，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它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帮的辉煌。（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不少学者指出，宋代商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明代商业更为典型。云南也早就有商业传统，但在明清之际曾经衰微、继而又复兴，从宏观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交通、工业、农业到微观的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一百多年的商业史之中具体地展现出来。本书因此从商业史的角度研究云南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表现，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以求突破行业和领域的限制，将宏观的观照、总结与微观的剖析、展示较好地结合起来，立体地呈现云南在这 100 年中的商业史。

我们认为，深入研究这一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云南和中国西南、中国边疆的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人文安全总结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理论，并对当代云南实施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战略的方法、

理论、策略、计划、步骤和意义都提供丰富的经验。“鉴往知来”，这一研究既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的成果。

在此还附带说一下，关于本书的研究虽不尽如人意，但总可以引起关注、讨论，从而不断新生。在时间层面上，如同书名所说，是百年但又并不仅限于确切的 100 年时间，因顾及源流而在前后都有所突破；在社会层面上，本书属于概论和述评的性质，更具体的研究将分别由本丛书的其他各专卷承担，而本书涉及的领域，所谓“商业”，持一种泛化的理解，囊括上述时间范围内除了政治、教育、农业、手工业之外的多个行业，而不是现在所理解的属于流通领域内的商品交换业务。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民国三年（1914 年）颁布的《商人通例》第一条所说：“本条例所称商人，谓为商业之主题之人。凡左列各种营业，谓之商业。”陈征平先生将其所列行业内容与按现行产业含义所做的业别分类作了比较，抄引如下：

序号	《通例》中规定的商业类别	按现行产业含义所做的业别分类
1	买卖业	商业类
2	赁贷业	金融业类
3	制造业或加工业	工业中包括轻重工业两个门类
4	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	包括工业与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门类
5	出版业	工业中轻工业类
6	印刷业	工业中轻工业类
7	银行业兑换金钱业或贷金业	金融业类
8	担承信托业	金融业类
9	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	商业中服务行业类
10	设场屋以集客之业	商业中服务行业类
11	堆栈业	商业类
12	保险业	金融业类
13	运送业	交通运输业
14	承揽运送业	介于交通运输与服务的中间部门
15	牙行业	商业类
16	居间业	服务业性质
17	代理业	服务业性质



资料来源：彭泽以《中国工商业行会史料集》下册，988~989页，中华书局1995年。

（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年》，296~298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

因此，我们说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即是流通领域内的商品交换，但我国历史上所谓的“商”却不限于此，而是包括了“士、宦、农、工、军、伎、僧、道”等特定的社会身份者的特定职业之外的经济行为及其所属领域。本书因为大量涉及传统社会史实，所以对商业的界定即以传统理解为准。



总序 / 熊清华

前言

第一章 云南的商业传统

第一节 贸易作为一种生计方式	4
第二节 商业的衰落与复兴	12
第三节 云南商人的家国情怀	20

第二章 商道、集市与城市

第一节 古道与马帮	38
第二节 铁路、公路，抗战之路	51
第三节 通道与集市（市场）	67

第三章 商人、商号、商帮与会馆

第一节 云南的四大商帮	74
第二节 云南商帮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108
第三节 省际、国际贸易与会馆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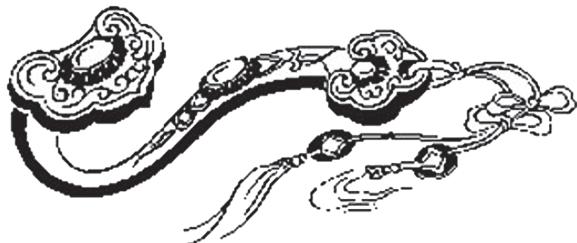
第四章 商品与品牌

第一节 矿产	132
第二节 茶、盐、鸦片	143
第三节 品牌	160

第五章 商业与近代云南社会变迁

第一节 资本竞争中的民族主义	198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文化转型	210
第三节 商业与商道造就云南城市	217

参考文献 228



第一章

云南的商业传统

第一节 贸易作为一种生计方式

古代印度文明与古代华夏文明在文化、物产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多方面的互补关系，云南地处这两大文明的过渡地带，成为它们的接触区域，因此在很早的时期即具有商业活动并逐渐积淀为商业传统。应该说，至迟不晚于西汉时期就已经有商人往来于滇川之间，其足迹远至古代印度。从时间线索来看，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张骞自蜀至夜郎，谋通身毒，但为昆明夷所阻。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动巴蜀兵，前往镇压，虽斩首数十万，亦未能通。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中国军政势力始达滇西边隅，设置永昌郡，辖叶榆、不韦、比苏、云南、嶲唐、哀牢、博南、邪龙八县，乃得与缅甸、印度直接交往。

云南高山起伏、江河纵横，各处山间盆地是其中相对富裕的聚居区，往往在很早就以农耕为业。但这种山间盆地在云南的土地面积中所占比例极小，更多的地方则是山地和坡地，不宜农业，而多行游猎、游牧、游耕之业。各地的民族族群也因此在平面上分群杂居，在高山上呈错落聚居的分布特点，生活资源与生计方式则多呈互补关系。从秦汉以前到近现代，几乎都如此。

考古显示，洱海周边的远近区域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有发达的农业，例如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等考古遗址，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到了（唐）南诏中后期，洱海区域和昆明区域等地区的文化已经与内地的差别很小了：“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邻族里，更相宴乐，三月〔应为日，作者〕内作乐相庆，惟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荔，如岁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余节日，粗与汉同，惟不知有寒食、清明耳。”（《蛮书》卷八）

另一方面，《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其中显示西汉时期洱海区域应该是以游牧为主导的社会。到了唐初，正如《新唐书·南蛮传》中说：“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畝湿，宜粳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现这仍然是以游牧生活为主导。

游牧生活在当地之所以能够稳定地持续下去，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获取食物的途径较多且较容易，故不运用多少先进的生产技术也能较好地生活。游牧社会除了常规的牧业和狩猎、采集、农业等生产活动之外，部分人群也经由掠夺和贸易来获得额外的生活资源，掠夺与贸易及赏赐都是广义的社会交换的一部分，其性质就是从他人那里获得资源。（王明珂，2008年）将游牧社会的这些特点与南诏大理的社会面貌比较，无有不符，只是到了大理国时游牧活动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已经较为明显地让位于农耕而已。

根据史学者对南诏时的研究，南诏后期与唐朝征战不断，其中却多次出现南诏军队与南诏王室表现不一致的军事行动，可能是这种游牧社会的基层组织具有独立行动权利的风俗之遗留。例如，唐文宗和三年（829年），“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救兵逐，嵯巅身自殿，至大渡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



赴水死者十三。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明年，上表请罪。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新唐书·南蛮传》）

这种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区别，也可能是云南坝区与山区、半山区的区别，因为云南从西汉到唐代的气候和地理都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以为云南各地都是游牧为主，就不能合理解释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大理大丰乐等考古发现和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等记载所反映的农耕社会，以及现实上存在于农耕社会组织中的商贸所为。

虽是农耕社会漫漫时空，而司马迁还是发现并在《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时从四川经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史称“蜀身毒道”。它从成都出发，分“五尺道”和“零关道”两条路线进入云南，在大理会合后，又踏上“博南古道”往缅甸而去，直达印度，最终可通向中、西亚的阿富汗等地，并延伸到更远的欧洲。季羡林先生推测“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必已输入印度”。方国瑜先生以为：“最早中、印往还经过西南夷的交通线，各家所说是一致的，至于取道南海及西域，则为汉武帝以后之事。其可以确定早期中、印交通的实物资料，则有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琉璃珠……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琉璃，当自印度传入。其时代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在这时期已有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交通线了。”（方国瑜，1987年）也就是说，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成都的商品就已经通过这条古道远销到了印度、阿富汗等国。

《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载：“及汉兴，皆弃此诸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其中所说的四川商人的走私活动，必然要和云南人打交道，那么云南的商业活动也大致可想而知。蜀地、身毒、大夏商人虽然行走几千里，但他们交易的蜀布、邛竹杖之类商品比他们都走得更远，他们采用这种一站接一站方式传递的转口贸易，主要原因可能是有山川阻隔，更可能是各地之间的族群/民族不同，语言与风俗都不相通，一个地方的商人不能冒着生命的和商业的风险走得太远。

到了魏晋时期，因为处于蜀身毒道的重要节点，保山一带的商业兴盛，《魏略·西戎传》亦载：“大秦道既从海北路通，又循海西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三国志·魏书》卷30裴注引）《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